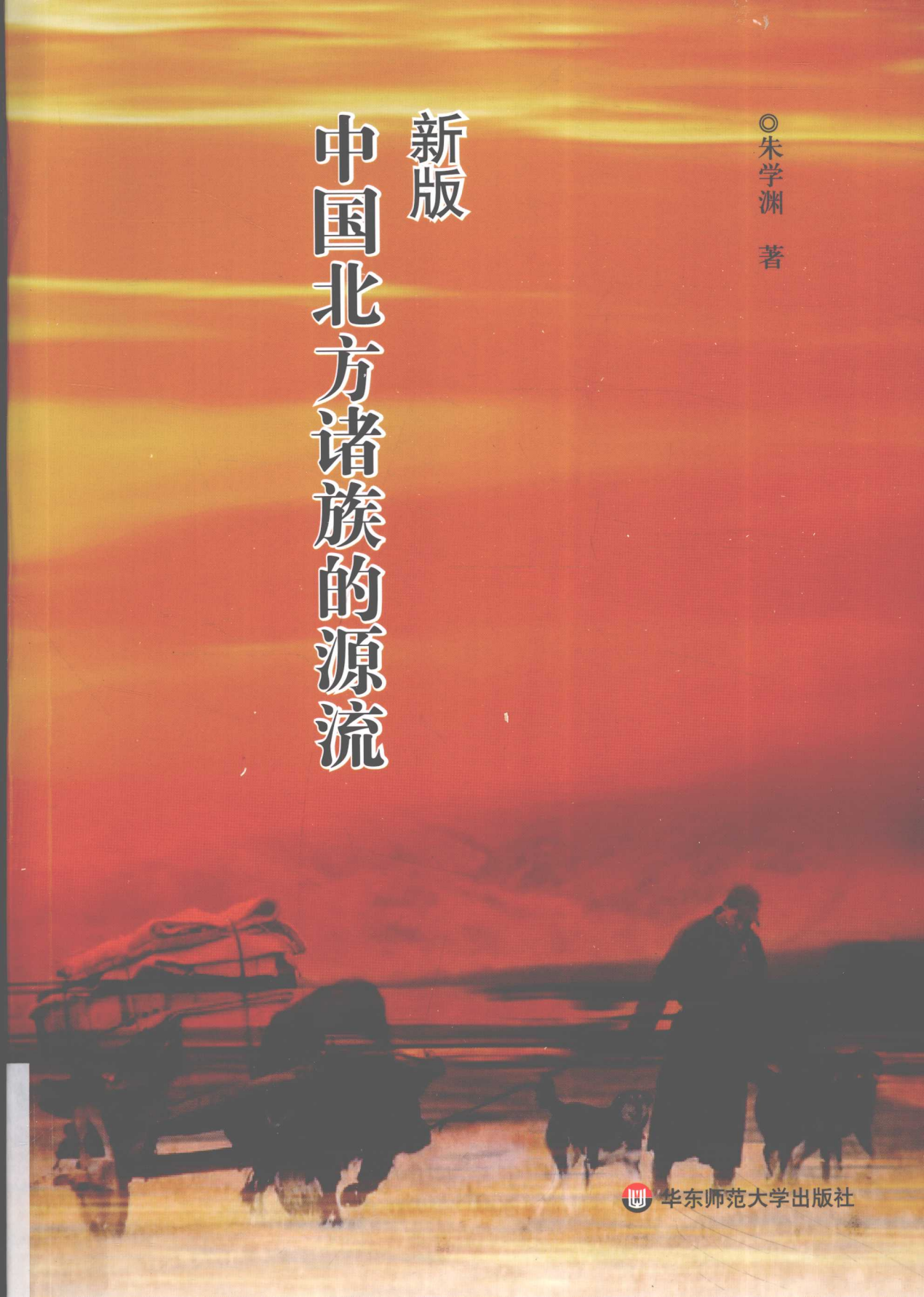


◎朱学渊 著

新版 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三
C
C

新版 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

◎朱学渊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版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朱学渊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7-5617-7332-1

I. ①新… II. ①朱… III. ①古代民族—民族历史—
研究—中国 IV. ①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1240 号

新版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

著 者 朱学渊
文字编辑 李 雯
装帧设计 黄惠敏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浙江省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6 开
印 张 23.25
字 数 358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一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7332-1/K·319
定 价 4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目 录



新版前言——为中国史学的实证化而努力 / 1

原族——对《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一书的几点

看法 周策纵 / 6

旧版自序 / 13

第一篇 Magyar 人的远东祖源 / 17

第二篇 蒙古语民族中的通古斯血缘成分 / 43

第三篇 欧亚草原诸族的通古斯成分 / 57

第四篇 鲜卑民族及其语言线索 / 73

第五篇 匈奴的族源、语言和迁徙 / 91

第六篇 Hun 人的鲜卑-通古斯族源 / 109

第七篇 嚧哒与唐代中亚蒙古人种诸族 / 131

第八篇 西域族国名与北方民族族名之关联 / 149

第九篇 藏民族中的北方诸族成分

——兼证“西羌”与“北狄”同源 / 169

第十篇 古代中原汉语中的通古斯语、蒙古语和突厥语
成分 / 201

第十一篇 西羌民族的血缘和语言 / 221

第十二篇 东方民族对西方世界的早期入侵 / 251

第十三篇 中国北方民族的族名 / 281

第十四篇 族名、人名、地名关联拟谱 / 297

参考文献 / 355

后记 / 361

新版前言



——为中国史学的实证化而努力

我研究北方民族只有十一二年的功夫，之于毕生从事某一课题的专家来说，只是乐在其中的瞬间。然而，在大陆出版的《中国北方诸族源流》和在台湾出版的《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却在海峡两岸冷寂的学术类书籍市场中得到热情回报，这对于涉史不深的我来说，自然是非常鼓舞的。

批评意见主要是关于我采用的方法，即以比较语言来达成对人类迁徙的认识。这种批评的根据可以总结为：语言是用文字记载的，而汉语则是用图形构造的汉字记载的，它们是表义而不表音的，每一个汉字在各个时代的读音也未必是一致的，因此用汉字记载的语音数据，如人名、地名、族名，都必须逐字逐代地辨认其读音。而这样的工作已经由古代训诂家和西方汉学家完成了。

一位语言学者建议我常备一本瑞典人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的《汉文典》(*Grammata Serica Recensa*)。他说：“大多数汉字的上古和中古读音及其转换规则都可以在里面查出来。对这些读音的理解不是靠现代方言能够取代的。历史语言学就像文科里面的理科，自有其严格的科研规范，音转规则就像数学公式，其间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想象的空间。”言外之意是：一切汉字语音的“正确”结论已由前人缔造完毕，新的努力就只能产生“谬误”了。

事实上,这不是什么“规范”,而是一种特殊的“意识”,科学是要打破思想的禁锢,而这种意识却是要固化人们的思想,因此它一定是科学的敌人,不幸的是它又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二十世纪中国学术也发生过一些变化,但其主流是从“迷古”转为“崇洋”。如果后者是采用西学方法也好,不幸的是大部分人只接受西方人的个别结论;而一旦接受了它们,又企图把它们固化起来。

二十世纪,由于比较语言学方法的应用,汉语语源学(如“汉藏语系理论”)就很有斩获。但对汉字古代读音的研究,如高本汉对汉字上古音、中古音的构拟,只是将中古韵书进行的拉丁化注音和有限程度的猜拟反推,正如他自己在《汉文典》的新版导言中所说“在许多未解决的问题上抛弃了传统的解释,引入了新见解”。因此,外国人高本汉的思想不断在“吐故纳新”,中国人却要将他奉若“生而知一切”的神灵。

就本书讨论得最多的族名“女直”、“女真”而言,蒙古语和女真语将它们读作“主儿扯”、“朱里真”,这表明“女”字除读 nū 音外,还读与“主”、“朱”相谐的 ju 音;但《汉文典》中“女”字的“两古音”只是 nio、niwo 而已。

在《汉文典》的导言中,高本汉认为“女”的 ju 音“实为‘汝’的假借”,这显然倒置了“女”和“汝”的本末,“汝”的 ju 音借自“女”字的 ju 音,才是合理的结论。然而,在正文中高本汉又只将“汝”字拟为 nio、nziwo(n、z 均为卷舌音,此处无法标出)，“汝”字的 ju 音也被他舍弃了。因此,按他自己的逻辑,“女”字就没有读 ju 的依托了。

再如,他还将“黑”字的“两古音”构为 xmək、xək,其中 xmək 显然是为“墨”字的读音 mək(即 mo)打的埋伏,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亦有此云;如果能认识蒙古语和突厥语的 hala、kara 是汉语“黑”字的语源,他们都决不会做此“复辅音 xm”之误拟的。高本汉和王力都没能从汉语汉字的循环“内训”中走出来,或者还没有能够找到更合理的非汉语“外训”坐标。

而一旦认识了“女”字的 ju 音,以及 ju、qu 间的清浊转化,《史记·五帝本纪》中的姓氏“姬訾”,西域地名“龟兹”、“屈支”,当然都是“女直”;而匈牙利姓氏 Gyurgyi、Gyurcsany(gy 读 j, cs 读 ch),俄文族名 Чудь、Чудьн,无疑也是“女直”、“女真”了。二十世纪不乏利用粤语、闽语、朝鲜语、越南语、日本语对北方汉语进行比较研究的高明先例,而蒙古语、女真语、俄语、匈牙利语对“女直”、“女真”的叫法,为什么就不能是“女”字读 ju 的实证呢?

又如，匈奴王号“单于”俗读 chan-yu，而《汉文典》和《同源字典》都正确地给出了“单”的古代读音 tan。我略有区别地认为“单”是读 da 的，因为“单于”应是蒙古语“酋长”一字 dar-ga 的近音。而基于《汉书·匈奴传》“单于，广大之貌也”的说法，“单于”也须与蒙古语“广阔”一字 del-ger 音近。

然而，《汉文典》给出“单”字的七个出处：

《诗》俾尔单厚；

《礼》岁既单矣，世妇卒器；

《书》乃单文祖德；

《左》单毙其死；

《礼》鬼神之祭单席；

《诗》其军三单；

《书》明清于单辞。

无一能成为“单”字不读 chan 的理据，它们统统都是“单”的“诗经字源”，而不是它的“诗经音源”。因此，尽管西人高本汉和国人王力的工作是重要的，乃至可能是伟大的，但远非是完备的，后人还大有进一步改良的空间。

夷狄语言却能用来“外训”古代“单”字是读 da 的。《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说“沃沮还属乐浪……在单单大领之东（应为‘之西’）”，有人以为“大领”是“大山”、“大岭”之误。其实，“大领”是《金史·国语解》说的“忒邻，海也”，或蒙古语“大海的”一字 dalain。而“单单大领”就是“鞑靼海”（今“日本海”），陈寿显然不知道“单单大领”的意思，但把它的读音准确地记下来了，这就使我们今天还能识别“单单”就是“鞑靼”。这就是“单”字读 da 的一个古代证据，也是我们颠覆“单于读 chan-yu”的一个支点。

显然，高本汉也意识到《诗经》并不是最古的汉字字源，因此他还尽力列举了许多甲骨文字。他把它们罗列在《汉文典》中，然而又只把它们当作“意符”，那是不能解决任何汉字读音的问题的。我在《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一书的前言中说：

如甲骨之“帚”字是“妇”，早已被郭沫若破解；但甲骨氏族名“帚好”、“帚妻”、“帚妹”、“帚妊”、“帚白”、“帚姝”中的“帚”是音符，还是意符？始终没有正确的理解。如果我们能有语音实证的自觉意识，它们不是“回纥”、

“兀者”、“乌马”、“斛律”、“悦般”、“恶来”，又是什么呢？

而司马迁还遇到过一种更古老的语言或文字，他在《五帝本纪》结尾时说：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上古）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训），荐绅先生难言之。

我以为“雅言”或“雅驯”是指后来形成的汉语，而记载黄帝事迹的《百家》是“前汉语”或“非汉语”时代的著作，它很可能是用楔形文字写成的，这种文字的考古发现近年已经开始出现。它记载的上古中原的语言，应即是今世北方民族语言的祖先。

二十世纪甲骨文字的成功解读，使中国史学的实证化有了长足进步。而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在揭示商族是“鸟夷”的同时，也认识到商族与东北“鸟图腾”民族的关联，从而把历史人类学推进到几乎破局的边缘，然而他们未能成功。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未能进入现代比较语言学的实证领域；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原地区还曾经有过一个漫长的“戎狄时代”。

顾颉刚是一个有大胆思想的先进人物，但他依然因循传统观念来点校《史记》。以《秦本纪》说的“（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灭小虢”为例，“邽”、“冀”既为戎狄，为什么就不能是一个双音节的戎狄族名，而非要将它们断成两个单音节的族名“邽”和“冀”呢？而这样的断点远非只此一例。

《后汉书·西羌传》又说“渭首有狄、獯、邽、冀之戎”，此中“邽”、“冀”两字依然连用，为什么它们一定要纠缠在一起呢？依我看“邽冀”就是“女直”，“杜郑”就是“突厥-n”；而“小虢”则是与人名“少昊”相关的族名，也就是该传记载的族名“烧何”，或是流徙到欧洲的匈牙利姓氏 Sáhó（音 xia-ho，匈牙利语 s 读 x、sz 读 s）等等。

顾颉刚以“疑古”成名，其实那并非真是“疑史”，大多只是“疑书”而已，即质疑成书的时代或作者的真伪，但这之于中国人愚昧的“敬书”传统，却很有叛逆的意义。“怀疑”是“实证”的动力，而“疑书”也推动了“证史”的热情。今天，李学勤的工作大多是“证史”，顾先生生前很器重这位弟子辈的李先生。然而，一些信奉了“疑古”精神的先生，却以为“证史”的后进是反对“疑古”的先圣的大逆不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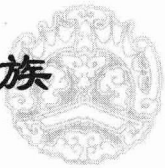
科学是知识的进化系统,即基于一些认识背景和方法,不断达成新的认识,并成为新学科和新手段的生长点。传统学术只求“知”不求“识”,既不清理,也不外延,于是成了一堆垃圾,而那些钻在垃圾里“掏来掏去”、“倒来倒去”或“叨来叨去”的人,就是所谓的“朽儒”了。现代出现了几个比较杰出的人才和一些比较象样的成果;立刻就会有一些人将他们捧为“圣贤”,把他们的成果固化起来,从而让学术思想就此再止步五百年。

语言学是人类学的当家学问,然而中国语言学者却大多成了文字学的俘虏,本书是为涉及中国人类源头的史学实证化做的一个努力。几年前,新西兰曾经发生过一场小小的“名利”之争,某大学的一些分子生物学家采用基因手段证明了某些土著部落的血缘关联,而该校的一些语言学家们则声称,他们早在许多年前就预言过这个结论。我真希望有朝一日中国的历史语言学家也能认识到自己的伟大功能。

《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原为中华书局柴剑虹教授集辑的“世界汉学论丛”的一部;我把它改写成许多篇通俗文章,大多被《历史月刊》录用发表,原任社长虞炳昌先生建议我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这就是新任社长东年先生主持“历史智库”出版的《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当我向东年先生提出再出版《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的繁体本时,东年先生又一口答应了。

五年前,虞炳昌先生曾经希望我能编一部“北方民族族名大谱”,为后人研究中国北方民族提供便捷的工具,我当时是很畏难的,但一直留心着这件事情,本书最后一篇《族名、人名、地名关联拟谱》即是献给虞炳昌先生的,他和东年先生对我的厚爱,令我此生难忘。

二〇〇八年四月十七日


 原族

——对《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一书的几点看法

周策纵

朱学渊博士把二〇〇二年五月中华书局出版的他的书《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寄来,说准备在台湾出修订版,并要我写一篇序。我早先就读了他第一篇文章《Magyar人的远东祖源》,他说 Magyar(读“马扎尔”,即匈牙利)事实上就是中国历史上的“靺鞨”族。他从“语言、姓氏、历史故事和人类互相征伐的记载中”,勾画出了一个“民族”的始末,旁征博引,我认为有很大的说服力。后来他又讨论了通古斯、鲜卑、匈奴、柔然、吐火罗等许多种族和语言,一共辑了九篇论文,还有“附录”和“后记”,就成了本书。

大家都知道,十九世纪下半期以来,欧洲一些汉学家由于兼识多种语言,而对中亚、远东诸族的姓氏和源流多有研考,成绩可观。如斯坦因(Sir Aurel Stein, 一八六五——一九四三)、沙畹(Édouard Chavannes, 一八六五——一九一八)、伯希和(Paul Pelliot, 一八七八——一九四五)、马伯乐(Henri Maspero, 一八八三——一九四五)等尤为显著。中国的冯承钧(一八八七——一九四七)翻译了不少他们的著作。其实是应该全部都译成中文的。中国学者懂这些语言的太少,像陈垣、陈寅恪都已经去世了,季羨林教授又已年老。将来只能靠年轻一代。

学渊这本书远远超过前人,对北方各少数民族不但索

源,并且穷流,指出亚、欧种族和语言融合的关系,发前人所未发。尤其难得的是,他本来是学物理学的,能不受传统人文学科的拘束,独开生路,真是难能可贵。读了学渊《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一书之后,不免有许多感想,这里只能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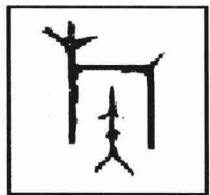
第一,中国人“族”的观念起源很早。至少于三千五百年前甲骨文中的“族”字,就是在“旗”字下标一枝或两枝“矢”(箭)。丁山解释得很对,“族”应该是以家族氏族为本位的军事组织。这种现象在北方诸族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旧唐书·突厥传下》说的:

其国分为十部,每部令一人统之,号为十设。每设赐以一箭,故称为十箭焉。……其后或称一箭为一部落,大箭头为大首领。

这里的“箭”,本义为“权状”或“军令”,后来则转义为“部落”了。又像满洲“八旗制度”,将每三百人编为一“牛录”(满语 niru,意为大箭)。因此“八旗制度”和“十箭制度”,也都在“旗”下集“矢”,是军事性的氏族组织。“族”与“矢”的这种关系,可以说中原汉族和北方民族是息息相通的。学渊说北方诸族是从中原出走的,这或许是个合理的证据。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图一 汉字“族”的历史流变

箭是人类早期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对这个字的研究,自然非常重要。它

在匈牙利语中是 nyil, 芬兰语中为 nuoli, 爱沙尼亚语中为 nool, 竟都与满语的 niru 如此相近; 而汉语中的相关词汇“弩”、“弩”等是否与之相关, 也很值得深思。中国古文字研究, 重“形”和“义”之解释, 固然有其特殊贡献, 但忽略“语音”的构拟, 已经被诟病得很久了。总有一天是要兼走这条路的, 而舍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恐怕不能成功。

第二, 关于唐太宗征辽东(高丽)的战争, 正史的很多记载并不真实。在学渊的《Magyar 人的远东祖源》一文中, 他详细叙述了这场战争, 但引用的却多是中国官史的说法。多年前, 好像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一位美国朋友赠我一文。他根据高丽方面的记载, 说贞观十九年(公元六四五年)六月安市城(今辽宁海城南)之战, 因高延寿、高惠真率高丽、靺鞨兵十五万来救, 直抵城东八里, 依山布阵, 长四十里, 抵抗唐军。唐太宗亲自指挥李世勣、长孙无忌、江夏王李道宗(太宗的堂弟)等攻城, 然而经过三个月还不能攻下。后来因为太宗中箭, 只得在九月班师。

可惜这篇文章一时找不到了, 我只能从中国史料来重构一些真相。而中国官方记录都是一片胜利之声, 实在离真事很远。据《资治通鉴》说, 安市之战时, 李道宗命傅伏爱屯兵山顶失职, 高丽兵夺据土山。太宗怒斩伏爱以徇, 李道宗“徒跣诣旗下请罪”。太宗说“汝罪当死”, 但“特赦汝耳”。据我看, 太宗中箭, 大约即在此时。而靺鞨兵善射, 太宗可能就是中了靺鞨之箭。

《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说:“高惠真等率众援安市, 每战, 靺鞨常居前。帝破安市, 执惠真, 收靺鞨兵三千余, 悉坑之。”同书《高丽传》所说的“诛靺鞨三千余人”, 当是同一件事。太宗对高丽军都很宽恕, 独对靺鞨人仇恨, 必非无故。九月班师, 《通鉴》说是“上以辽左早寒, 草枯水冻, 士马难久留, 且粮食将尽”。其实都只是借口。

《通鉴》又说, 这年十二月太宗突然患痈疽, “御步辇而行”, “至并州, 太子(李治)为上吮痈, 扶辇步行者数日”。还有侍中兼民部尚书和礼部尚书刘洎, 本是太宗的亲信大臣, “及上不豫, 洎从内出, 色甚悲惧, 谓同列曰: ‘疾势如此, 圣躬可忧。’”太宗居然用“与人窃议, 窥窬万一, 谋执朝政”的罪名, 赐他自尽。其实他不过是透露了太宗受箭伤的消息, 竟惹来了杀身之祸!

《通鉴》还说, 二十年二月, “(太宗)疾未全平, 欲专保养, 庚午(阳历三月二十九日), 诏军国机务并委皇太子处决。于是太子间日听政于东宫, 既罢,

则入侍药膳，不离左右”。褚遂良谏太宗多给太子一些闲暇，说明太宗已把责任都交给太子了。二十二年五月，太子率更长史王玄策击败天竺（印度），得其方士那邈迦娑婆寐，自言寿二百岁，有不死术。太宗令他“采怪药异石”，以求“延年之药”。据我看，太宗是想要治箭疮。二十三年（公元六四九），五月己巳（阳历七月十日），太宗服丹药反应驾崩。他死后四天才发丧。当时宣布他年五十二，实际只有五十岁。

中国后世史家，甚至写唐史的人都很少留心敌人方面的记载。我只注意到钱穆先生的老师吕思勉在他的《隋唐五代史》里怀疑官方的说辞。他说：

《新唐书·高丽传》曰：始行，士十万，马万匹，逮还，物故载千余，马死什七八。船师七万，物故亦数百。（《通鉴》曰：战士死者几二千人，马死者什七八）此乃讳饰之辞，岂有马死什七八，而士财（才、仅）丧百一之理？

当然，他还没有注意到高丽方面的记录，可是有此见解已很不容易了。

第三，关于李唐家族的血缘，前人也有些研究。陈寅恪曾发表两篇论文，认为唐朝皇室基本出于汉族。日本学者金井之忠发表《李唐源流出于夷狄考》一文反驳。陈寅恪又写了《三论李唐氏族问题》来答复。陈说：李唐祖先李熙及妻张氏皆汉族，其子李天赐及妻贾氏亦皆汉族，其子李虎自系汉族，虎妻梁氏固为汉姓，但发现有一例为胡人，乃只好作为可疑了案。陈寅恪是依传统，以男性血缘为主，所以终于认定李唐为汉族。

依照我从男女平等的看法，张姓本多杂胡姓，李唐皇室早已是混血种。李虎之子李昞本身已可疑，其妻独孤氏（即匈奴屠各氏，后改刘氏）当是胡族，他们的儿子李渊（高祖）必是汉胡混种，胡血可能在一半以上。李渊的妻子窦氏（太宗之母）乃纥豆陵毅之女，更是鲜卑族胡人，所以唐太宗的胡血，至少有四分之三。太宗的妻子长孙皇后（高宗的母亲）是拔拔氏，高宗身上汉血的成分已很少很少了。

据陈寅恪考定，高宗做太子时，即烝（上淫曰烝）于太宗的“才人”武则天，太宗死后便直接娶了她。为了避免显得他是直接娶了父亲的爱妾，便又伪造武则天先在感业寺为尼，然后才把她娶来的假故事。这虽像掩耳盗铃，但于胡血甚浓的李唐家族来说，从“父死，妻其后母”的胡俗，又有什么可惊怪的呢？皇族还可略加追索，至于一般老百姓，当然更是一笔糊涂账。

中国历来对姓氏和血缘的研究就不用心，章太炎在《自述学术次第》中说：“姓氏之学……所包阔远，三百年中，何其衰微也！”姚薇元于抗战前师从陈寅恪，他在一九六三年出版《北朝胡姓考》，于“绪言”中说自己是“以蚊负山”，也不为无故。

第四，这里还必须指出，太宗的妻子长孙皇后，于贞观十年六月己卯（阳历七月二十八日）因病去世，实年仅三十五。她的英年早逝，对唐朝的命运关系重大。身为皇后的她，既好读书，又反对外戚弄权。她的哥哥长孙无忌与太宗是“布衣交，以佐命为元功，出入卧内，帝将引以辅政，后固谓不可”。她向太宗说：“不愿私亲更据权于朝。汉之吕、霍，可以为诫。”（《新唐书·后传》）太宗不听，任无忌为尚书仆射，即宰相之职；她却勉强要哥哥辞谢了。她一死，无忌就当了权，扶持了外甥李治做太子。亲征高丽时，有人建议直取平壤，无忌却主张先攻安市，结果有太宗的中箭。

后来高宗因常患“风眩”，一切由武则天控制。她把唐朝宗室几乎杀尽，连太宗的爱女和女婿，以及她自己的儿女也遭诛杀。长孙无忌遭贬谪赐自尽，褚遂良则死于贬所。武则天终于篡了天下，做了皇帝。说来，在玄武门事变中，太宗把同母兄太子建成射死；自己后来也因中箭伤而驾崩，可谓报应不爽。而他让人把胞兄建成和胞弟元吉的头割下来示众，还把他们的十个儿子都杀光。时元吉仅二十三岁，想必他的五个儿子不过几岁，小孩又有何罪？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说：“是时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视其孙之以反律伏诛，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厄极矣！”《通鉴》则评得更痛快：“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仪刑（模范）也，后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摹拟），以为口实（借口）乎！”那几代皇帝都要靠军队平难，方能继位。太宗虽然是历史上的一个好皇帝，但他也为本朝后人树了坏规矩。上述的这些恶果，多少与长孙皇后和魏征的早死有关。魏征死于征辽的两年前。太宗在战事失败后，曾叹曰：“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太宗服丹药丧命，也是皇室的坏榜样，赵翼的书就有“唐诸帝多饵丹药”一条，说贞观二十一年高士廉卒，太宗欲去吊唁，房玄龄谏阻，“以上饵药石，不宜临丧”。长孙无忌更一再拦阻。这还不是那印度方士的药，但可见他早就在服丹药了。多年后，李藩对唐宪宗（八〇六一—八二〇在位）说，太宗“服胡僧药，遂致暴疾不救”。说的才是那印度方士的药。至于好色和乱伦，更是

唐朝皇帝们的家常便饭了。

最后,我想质疑学渊在《Magyar 人的远东祖源》的一个说法。他引用马长寿的结论说“阿伏于是柔然姓氏”,并且推论说:柔然是继匈奴、鲜卑之后,称霸漠北的突厥语族部落,公元五〇八年被高车族重创;又据欧洲历史记载,一支叫 Avars 的亚洲部落于五六八年进入东欧,曾经在匈牙利地区立国,并统治巴尔干北部地区两百年之久,八六五年为查理曼帝国所灭。欧洲史家认为 Avars 是柔然之一部;学渊以为 Avars 就是匈牙利姓氏 Ovars,或“阿伏于”的别字。很可能是在九世纪末 Avars 与 Magyar 人融合而成为匈牙利民族的一部分。

我原来以为学渊的推测很巧妙;可是一查他在注释里引马长寿的《乌桓与鲜卑》一书中所说的,不是“阿伏于”,而是“阿伏干”。再查马氏所根据的《魏书·长孙肥传》附其子长孙翰传曰:

蠕蠕大檀入寇云中,世祖亲征之,遣翰率北部诸将尉眷,自参合以北,击大檀别帅阿伏干于柞山,斩首数千级,获马万余匹。

马氏认为入寇云中是在公元四二四年。我查得柞山是在绥远界内,今属内蒙。

据陈连庆著《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初版,页一九八)说:

《魏书·官氏志》说:“阿伏于氏后改为阿氏。”“于”字系“干”字之误。《姓纂》七歌、《氏族略》均不误。《广韵》七歌误作“于”。

陈氏又说:

《魏书·高祖纪》云:“延兴二年(公元四七二年)二月,蠕蠕犯塞,太上皇(献文帝拓跋弘)召诸将讨之,虏遁走。其别帅阿伏干率千余落来降。”

为什么在四十八年之后,阿伏干又来投降北魏?我再查手头的中华书局标点本,原来陈氏又将“阿大千”错写作“阿伏干”了,他们不是一个人。

我以为“阿伏干”读音,最接近“阿富汗”(Afghan),而阿富汗人多数说的是一种属于伊朗语言(Iranian language)的普什图语(Pashtu)。当然阿富汗之名的由来还需查实,一九七〇年版《大英百科全书》说 Afghan 的名称是六世

纪印度天文学家 Varaha-mihira 首先提到,当时用的是 Avagana。同时期的中国历史似亦有线索,《魏书·西域传》记载过“阎浮謁,故高附翕侯,都高附城”。古之“高附”,就是今之喀布尔(Kabul);莫非“阎浮謁”就是阿富汗?此事还望学渊做进一步探索。

我在这篇序里要强调的有几点:(一)凡对外、对内关系或战争,都应该要比较对方的记录,平衡判断。(二)官方的宣传和记载,不可尽信。(三)偶发事故,像长孙皇后和魏征之死等,往往可有长远重大的后果,历史并非有必然定律可循。(四)美国素来以世界诸族熔炉自豪,当然可贵,但还只有三数百年发展;中国却早有三数千年的民族融合了。语言、血族、文化、文明的和平交流融会,更可能是将来的趋势。我看这也是朱学渊博士此书最重要的贡献。

二〇〇二年十月五日写成于美国威斯康星州陌地生市之弃园

旧版自序

中国北方诸族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是巨大的。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玉成了他们坚忍不拔的意志、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杰出的统治艺术。东西方文明社会持续数千年的激烈撞击,使它们的活动成为世界历史中最精彩和诱人的部分;而中国则承担了记载它们史迹的最重要的责任。本书无意重复描绘它们轰轰烈烈的业绩,而是试图解析它们语言的信息,俯视它们的源流,以及它们与东西方民族在血缘和语言上的关联。

涉及人类学和语言学领域的北方诸族的研究,是在西学东渐后才在中国正式展开的。然而,外人治中国史有条件的限制,中国人治自家史又有传统的束缚。双方虽然有不少重要的成果,但总体状况却是不尽令人满意的。尽管如此,法人伯希和、俄人巴托尔德、日人白鸟库吉等,以及中国的洪钧、屠寄、王国维、岑仲勉、陈垣、陈寅恪等人,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都有专精的见解和著述。

中国传统学术和西方学术间的区别,首先在于目标的差异。几千年来,中国的读书人都是以训练背诵和注释经典的能力,来达到做官行政的终极目标;结果往往是学贯满盈,而见地不足。然则,西方学者却能大胆假设,虽时有疏于求证的结论,而探新的优势反倒在他们的手中。就北方诸族研究而言,中国史料有必须被征引的机会,而中国学者之说却难有登堂的荣誉。面对西人的大胆宏论,国人